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UC

RUC Perspectives

思想评论

本期主题：传统内外：对外政策与其中国特性

作者：时殷弘

中国正面对巨大的国内任务历史性挑战和非同小可的国际压力，与此同时有似传统，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对外战略转变或“屈伸异变”，或许构成一种对这些挑战和压力的重大的回应，虽然能否真正有效地予以回应依然是个问题。

2016年 第2期(总第5期)

传统内外：对外政策与其中国特性

时殷弘^①

【阅读提示】当代和当今中国嵌有若干深刻的秉性，它们要么植根于多个世纪的悠久中国传统，要么来源于现代/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实践，并且全都对当代和当今中国的对外基本政策有其塑造性的影响，或在其对外行为方式中有其显著的反映。它们是：中心观念“维护”；“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循环”理念；对道德的强调；对外政策的压倒性国内功能；坚定信仰中国特性本身及其压倒性意义；“中国伟大复兴”的理念和实践；在“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之恒久情势中的政治审慎。它们分别最深刻地关系到：中国的统一完整并繁荣稳定；谨慎、忧患感、勤勉和创新精神；“以义为利”和“义利平衡”；“战略保守主义”和坚持和平发展；当代中国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和成功保障；作为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一大主题的伟大复兴与其基本实践方式；“中国特性”与国际共通；关于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的根本辩证原理。中国正面对巨大的国内任务历史性挑战和非同小可的国际压力，与此同时有似传统，正在我们眼前展开的对外战略转变或“屈伸异变”，或许构成一种对这些挑战和压力的重大的回应，虽然能否真正有效地予以回应依然是个问题。

当代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改革构成它的最根本特征。从另一方面看，当代中国又是传统之内和之外的中国：它以改革超越

^① 作者信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了先前的中国传统，但同时又以复杂精致的深刻的方式承继了中国传统，从而是真正中国特色的。在此，可以选取几个与对外态势和对外政策深切相关的观念和行为习惯，指出它们的传统中国特性，并且部分地总结和展望中国的国家方向、对外政策方向和某些相关的挑战或考验。

一、“维护”：保持中国统一完整并稳定繁荣

有一个中心观念——“维护”（用著名的新加坡中国学权威王赓武教授的话说）——深刻地嵌在传统中国的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之中。“维护”作为中国漫长历史的主题之一，意味着一项沉重的任务，即保持中国这一巨型国家统一完整，并且稳定和平。在传统中国，它强调的是中国历朝历代如何经受住外族入侵、征服和内部造反，而在当代中国强调的是中国政治领导在这么一种巨大和经久的努力中的坚毅、灵活和才干，亦即尽管有非凡的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动，但仍保持国家统一、政体稳定甚而社会繁荣。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经受长期教育和熏陶、并且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受重大折磨的一两代人，依然能进行创新性的调整以适应新的挑战，依然能在改革的同时维护中国的稳定和团结。对当代中国的政治领导来说，“维护”的基本含义之一，并且是其最好的中国传统意味上的，在于确保包括新疆、西藏和台湾在内的中国边疆地区，确保它们经久处于中国之内。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怀疑在这方面他们的决心和中国人民给予他们的支持。

当前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某些重大局势令人严重担忧。特别深刻和

有挑战性的是，台湾和香港的政治愈益成为“新政治”，即愈益民粹化、基础角色年轻化、动员网络化和群众行动非规范化，而“新政治”的很大一部分趋向是企求实在或潜在的国土分裂。中国政府和大陆人民如何既积极又稳妥地去适应“新政治”，对付“新政治”，不在“新政治”面前遭受重大失利或失败？我们就此面临愈益增进的挑战。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传统依靠力量和传统政策方式等方面，我们有一些重大的弱点，其中包括：过度执着于稳定、现状秩序和对“大众政治”的传统厌烦；原则坚定有余，但应变弹性不足；固守大体而言能力显著衰减、投机却愈见增多的上层朋友，而不交或少交一向疏远但影响日增的下层人物；多年不认真和耐心地争取对立阵营甚或中立群体中那些可能争取的人士，轻视或忽视分化对手、增多合作者或中立者的战略重要性。就此而言，“维护”不仅要有大决心，也要有好战略和好策略。

二、兴衰循环与审慎、忧患感、勤勉和创新精神

最传统的中国特性之一，是可称为“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循环”理念，加上它的传统的政治版本即王朝循环理念，即政治成功和繁荣难以避免地继之以衰落或倾覆。对中国当代政治领导来说，这在他们的心中必定相当重要和适切，特别是因为他们自己在改革时代以前的不良治理中的个人经历，连同改革带来的多有困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一认识大

大增进了他们的一种关切，即关切他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少裨益，从而大大加强了他们的警觉、审慎、忧患感、勤勉精神和政策创新精神，同时也使他们决心并真诚地向邻国和世界宣告永远不搞霸权主义，永远不试图恢复任何形式的“中华帝国”。在这一方面，意味深长和意义非凡的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4 年秋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骄傲自满，党不能骄傲自满，国家不能骄傲自满，领导层不能骄傲自满，人民不能骄傲自满”。

然而，近些年来，特别在与东亚和东南亚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公众和政府两方面的“胜利主义”往往显而易见，虽然在政府方面其程度较小，而且外交上的过度“高压”即使有，也大致是间或甚或偶尔的。损伤之一已经清楚，而且可以理解，那就是在相当关键性的数年里，给予东亚邻国和中国与它们的关系的注意力在减损，当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被赋予唯一的压倒性优先位置的时候，当它占去政治领导可用于对外政策的大部分有限时间的时候。如此，便缺乏中国与邻国间较好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从而与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了一种形势，即像《华尔街日报》早在 2010 年 9 月底就说的，“[在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同时发生反冲，提示了中国——它长期争取实现自身对外关系的均衡——在外交上的一种广泛失利”。

三、强调道德与“以义为利”和义利平衡

对道德的充分强调显然是中国特色的，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道德的强调既有其国内方面，也有其国际方面。与中国赫然崛起相伴随，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最突

出的是在 2006 年 4 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在其中，他强调传统中华文明的特征，即注重以民为本、自强不息、社会和谐和亲仁善邻，因而明白地示意了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道德/政治理想。习近平以同样浸透中国优良传统价值和当代中国外交现实感的方式，强调中国对外政策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他 2014 年 7 月在韩国首尔大学的演说中，宣告中国要“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他直接援引中国古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申明在在国际关系中“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应当说，乌克兰问题危机构成了对中国的一项重要的道德考验，考验中国与之相关的对外态势和政策能否做到并坚持“以义为利”和义利平衡。克里米亚被兼并之前，虽然与俄罗斯有着非常重要和显著发展了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充分理解俄罗斯在保持克里米亚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方面的传统的紧要利益，同时有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之间迅速和显著形成的堪称亲密的领袖个人关系，但中国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依然坚持并反复宣告不干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尊重别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根本的国际法原则，同时本着“制裁解决不了问题”的一贯立场，不赞成美国及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和外交制裁。这提供了中国对外政策“义利兼顾”的一个典型。不过，恰恰主要因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颇大的战略重要性，加上美国对华战略态度的晚近恶劣和战略围挤的加紧进行，在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兼并后，中国之公开诉诸上述国际法原则的频率和声响度非

常显著地减小，尽管俄罗斯策动或鼓励乌克兰东部分裂出去、以致最终将它并入俄罗斯的活动仍有张有弛地进行。

中国对外政策是否能“义利兼顾”，是否能具备足够和经久的、在国际政治中至关重要的道义可信性形象，依然在其他之外受着乌克兰问题的检验。不仅如此，中国的大国外交有着一种非常重要的内在平衡的需要：既不能为了对美对欧关系而过分损伤对俄关系，也不能为了对俄关系而过分损伤对美对欧关系。

四、国内关切优先、“战略保守主义”和坚持和平发展

人口多达 13 亿的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其压倒性的国内功能。事实上，完全可以从悠久的古老中国主流传统、特别是“对外政策文化”主流传统中找到这一点的绝大部分渊源。中国的悠久政治经验内包括一种哲理性和现实感兼备的、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稳定和繁荣的“战略保守主义”，它完全契合关于华夏与远方“蛮夷”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同时在成本效益方面极为合算（不“烦汗马之劳”）。这在新的当代历史条件下多少被有机地承继下来，大有利于中国的非常突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成就，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关于对外政策的审慎的战略文化。

诚然，中国的强劲崛起，国内增长对外部资源的迅速增大的依赖，西方强国影响力相对衰减带来的机会，还有更大的民族荣耀的天然吸引力，并非全无可能结合起来，导致对外态势的基本变化，使中国改变压倒性的国内优先惯例。然而，也许我们和世界都可以期望，基于多年经验的审慎和耐心的战略文化，加上一个巨型发展中国家的经久

的国内任务艰巨性，特别是多达 13 亿的巨量国内人口实现健康发展和生活幸福的艰巨性，依然并仍会将中国对外态势保持在“较温和的调整和有分寸的伸张”限度内。习近平主席最近再度宣告：中国“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爱好和平，历来知道‘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我们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样的宣告既出自中国千年文化传统，也出自当代中国基本经验。

当前，有一个可谓基本的战略问题与能否坚持有益的“战略保守主义”传统、能否坚持应当经久的和平发展国家方向紧密相关，那就是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而这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坚定的战略轻重缓急意识，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在有广泛的战略铺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此乃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或常理，犹如东汉瓦解时期天才的战略家荀彧给其战略统帅曹操的战略谏言所云，“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后汉书·郑孔荀列传》。）为此，所有其他“战场”的战略期望，还有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位置被打上恰当的折扣。

然而可以说，中国在晚近三年那么短的时间里，开辟或固化了那么多“新战场”或“新战线”，但其中没有哪一个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形成胜负决定的。因此，中国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同时从事多项或多线“战斗”。从战略常理来说，这是一种令人忧虑的局面。如果注

重两条基本的轨迹，即(1)中国经济在近两三年缓慢但顽固地持续下行，(2)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介入和海外扩展急剧增长，那么情况就可能更值得忧虑。做个比拟，中国的“存款”大概正在缓慢但顽固地相对减少，而中国的支出却在相当急剧地增加。也因此，根本的“战略透支”的风险或许正在增长。

我们面前的特别关键的战略问题，在于能否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鉴于中国当前的总体经济形势，国内的保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应该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近乎压倒性的战略重心。就此而言，中国的国内任务真正紧迫，而中国在海外的战略发力、权势扩展和光荣获取却总的来说却远非如此。战略努力必须有基于深思熟虑的坚韧，战略耐久性往往有决定意义。更广泛地说，中国成为伟大的世界强国是一项需要数代人前仆后继、经久努力才能够真正完成的伟业，每一代人可能获取的最好成就何在？就在于大致完成他们处于其中的每个历史性阶段的基本任务。

五、“屈伸异变”：传统经验和当今实践（上）

东汉伟大史家班固曾以他的一则非常深刻和格外长篇的政治评论去结束《汉书·匈奴传》上下全篇，那基于比他古老得多的中国政治经验和他心目中的“现代”历史教益，论说对付“蛮夷”的合适的战略大方针。它大概是班固曾做过的最精彩的政治/战略论说，而在其中丰富和深切的基本思想当中，有一项是强调这大方针应当是混合的和情势性的，内含合适的种种“硬”、“软”成分。用他的话说，“久矣，夷狄之为患也！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

堂之上乎？……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冑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也。”整个汉初约七十年的漫长的历史经验必然是复杂能动和情势性的，“旷世历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屈)伸异变，强弱相反”。

多少类似于汉初“战略和亲”与“战略克伐”的交互运用，我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strategic military)与“战略经济”(strategic economy)的同时合成实践。无论是习近平反复提倡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从2014年10月起大力提倡并主导建立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是中国在2014年11月北京 APEC 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实施或努力推进的“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全都可被认为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迹象或事态。此外还要加上已经完成谈判的中韩自贸协定和中澳自贸协定，还有中国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连同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

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西部）的权势影响：这就是愈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都是如此。服务于这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十八大以来中国主要使用的是广义的“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战略军力建设的更加速突进、中国对美国的强劲和广泛的

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本的持久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更加大踏步显著增强，战略活动范围急速显著扩展，同时强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领海主权声索。然而，它们也多少妨碍了中国的国际“软权势”，增进了中国东部周边的战略/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伴有与日本以及美国的显著增进了的冲突风险，并且作为其主要反弹，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战略“再平衡”的强化和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进程。

因而，很可能作为某种战略审视的结果，从 2014 年秋天开始，中国政府颇为急剧地实行了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这非常重要——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那就是在国内经济增长缓慢但顽固地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显著增进对中国产能的境外需求。考虑到 2014 年 10 月和 11 月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事情就更是如此。总之，中国政府已经并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将其对外政策着重面“分叉化”，使得“战略经济”成为其优先议程上另一个重大维度。

虽然如前所述，以“战略均势”为主的将近两年的基本方略有其非同小可的代价和风险，但这些并未令中国胆怯。“战略军事”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存在，存在于中国当前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曰战略复合态势）之中，如果考虑到中国对外政策仍有的、甚或增进了的复

杂性。

中国战略性军力的经久急剧增强仍在继续，甚至是以加速度继续，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必定如此。在这方面，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的西太平洋西部）的中美军备竞赛显著浮现，那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中国武装力量主要面对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正在加速度进行。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发展和伸张自身的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并有在南沙群岛的五至七个岛礁同时进行急速的大规模扩岛（包括建筑飞机跑道在内的军事或军民两用设施）作为其当今的首要事态。这看来多少像个“决定性一击”（*coup de grace*），大大加剧了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同时扩展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紧张。不仅如此，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已迅速地大为进展，特别是有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

因而可以说，中国当前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成了一种复合性的复杂路径，而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是个战略扩展，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在“战略军事”的上述仍然存在的重大方面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有着某些不可否认或漠视的抵触，它们应当是中国在战略权衡思考和战略平衡努力方面去应对的严肃的对象。

六、“屈伸异变”：传统经验和当今实践（下）

像“战略军事”的已有实践彰显的那样，“战略经济”为主的未

来作为也有审慎从事的必需。需要就“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高铁项目输出、“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等等的设想和筹划等思考相关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需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可以也必须就此作真正多方面的思索、研究和讨论。其中特别重要的在于，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连同为此进行远更充分的国际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现在关键的瓶颈在哪里？不在中央集权和地方主动（就“一带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动）的中国国内，而在于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的国际磋商和谈判，它们远为复杂、能动和滞后。目前中国一头大热，而其他国家仅小热和不热，唯已有 50 多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亚投行事业除外。

必须真正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界定它们需要什么。在这个至关紧要的方面，必须充分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当代生活经验、包括发展经验的对接。不能想当然地设定中国当代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广泛适用，普遍欢迎，而漠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复杂的特殊性，甚或在有些场合相反的取舍倾向。否则，我们会重蹈自己反复批判的西方普遍主义的覆辙。

必须注意少说多干，谨防未真干而先大吹。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感，并且引发和加剧中亚各共和国和南亚/东南

亚/印度洋小国的猜疑。非常重要是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期望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众多国家的领土上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而这些基础设施体系固有其几乎“天然的”敏感性。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主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这类建设“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相关的不良效应，如果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还有，关于外国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同样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推进它们的速度不可太快，“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因而一定要分阶段，一定要分不同的阶段性深度；一定要对我们的知识限度、影响力限度和战略策略的精明限度有清醒的认识。需要仔细地地区分或分辨就不同问题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而言的一个个不同的具体形势，形成和修改不同和具体的战略设想甚或战略规划。与此同时，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有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而且，前者还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

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其他重大的对外经济项目是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一个愈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必须从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视角去看待它们。由此而来的一项重大要求，是尽管其中的不少组成部分必须优先服从非经济、非财政的目的，亦即外交、政治甚或战略目的，为此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接受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负面效应，然

而它们总的来说，必须产生广义和狭义的经济/财政利润，否则从长期来说所需的中国国家资源将难以为继，如果不为此过分减扣中国经济/财政的其他重要方面所需的资源投入的话。也因此，审慎地从事经济/财政评估，不让它们总的来说成为至少中长期意义上的“亏本”项目，是推进“一带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设项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线”。而且，由于它们大多将处于经济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境内，这必需或“底线”特别要在规划和实施中予以注意。

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其他重大的对外经济项目也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部分，它与其他一些重大部分密切相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后者。宏观上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战略和政策的审视、反思、调试和创新，争取经过一个历史时段去解决或大致解决一个就周边关系而言的全局性问题，即消减中国周边政策、周边行为和周边形象的较显著的内在紧张或自相矛盾性质，争取到适当的时候“搞顺”中国的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即令它们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的。这应当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而且对“一带一路”能够得到持久的成功推进至关重要。

七、伟大复兴：传统的一大主题

复兴是传统中国历史上常有的政治/社会甚或民族主题。所以常有，是出于两大基本缘由：(1)衰落甚或衰毁——王朝、国家、社会甚或民族的衰落或衰毁——构成传统中国周期性的最大事态类型之一；(2)传统中国有着贯穿千年而恒久不息的伟大“复原力”(resilience)。无疑，最大尺度上的衰落和复兴，就是华夏或中华

民族的衰落和复兴。就此而言，传统中国历史上（甚而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复兴乃是 2000 余年前的初汉，因为前此中华国度经历了约 600 年大乱，即从西周崩溃到楚汉战争为止连续不断的普遍分裂、频繁征战、暴烈血拼、外族侵掠、帝国暴政和激烈内战，以致社会凋敝到难以置信的程度，那据《史记·平准书》的载述是“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从高祖吕后，经文景两帝，到击破匈奴帝国为止的武帝，初汉诸君主是传统中国所曾有的头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者。这个复兴的起始的根本认识和根本理念，是高祖从善如流地接受了儒生陆贾的告诫，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那到文帝时期的贾谊笔下，被凝练为中国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论文《过秦论》之中仅五个字的最关键论断：“攻守之势异也”（“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据此，根本方向被定为、且坚定地保持为“离战国之苦”，“休息乎无为”，以便“民务稼穡，衣食滋殖”。与此相应，对内坚持惠农惠民，加上在文帝那里达到极致的宫廷节俭，对外则坚持忍辱负重，仅以坚决不容匈奴帝国向南长驱侵掠为限。这坚韧的努力到头来造就了惊人的伟大结果，那据《史记·平准书》，是“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以此为资源基础，武帝得以发动数次巨大规模的远征，决战决胜，击破构成致命威胁的匈奴帝国。

另一场伟大复兴，是由光武帝刘秀及其儿子明帝和孙子章帝造就的，那在刘氏王朝恢复的意义上史称“中兴”。在王莽“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以致社会业已严重凋敝、帝国边乱烽烟四起之后，先有“自然状态”似的暴烈的革命战争，继之以经久而艰辛卓绝的统一战争，其间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满目疮痍，以致食人惨剧比比皆是。光武帝在统一后的根本意向非常明确和集中，那用《后汉书·光武帝纪》的概语说，是“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未尝复言军旅。”特别是，针对两位重要将领的统一后好战提议，他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布一则立意和平、节俭、社会恢复和民众繁荣的历史性宣告，作为其帝国的坚定的大方向，强调“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他“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严格规制和教育东汉首代贵戚，以致他们大都深知“天道恶满而好谦”，并且以“方平诸夏，未遑外事”、“羁縻之义，礼无不答”为处理对外事务的总方针。在他和明帝、章帝治下逐渐复兴的国内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内部条件，使得明帝能够征匈奴，通西域，击叛羌，章帝能够“匡平诸国”、恢复西域。然而无论如何，“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依然是他们的坚定原则。

八、伟大复兴：当代的一大主题

仅就复兴的一大关键——“文治”与“武功”的恰当关系而言，当代中国的“中华复兴”努力与传统中国史上的辉煌范例何等相似乃

尔！邓小平在他执掌最高领导权的整个时期里，将党和国家的政治、精神和物质资源大都集中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大发展，并且为此将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相对“边缘化”，或曰推迟之，此即他的“军队要忍耐”的思想或要求。在这位特别兼具求实精神与宏远抱负的伟大国务家看来，浅显无疑的起码的战略道理之一，就是国家大局优先，构筑基础优先。

“军队要忍耐”原初就意在是暂时的：如邓小平所说，“（将来）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两大急剧的事态大概多少提早了当代中国军力建设和军事现当代化的强劲发动，那就是

（1）美国依凭骤然亮相的高技术武力极迅速利落地打赢海湾战争，这对中国的政治领导和军界造成了心理震动和思想冲击；（2）继而，“台独”威胁随李登辉 1995 年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论而急剧浮现和急速加重，从而带来了进一步的强烈刺激。在这些背景下，转折到来：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发动军力加速度建设和军事加速度现当代化，其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使中国与其武装力量具备打赢高技术、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能力。借用《华盛顿邮报》2005 年初一篇文章中的话说，“从头到脚的现代化正改造着中国军队”。到当今，尤其是在习近平执掌党政军最高领导的三年来，中国战略性军力的大增强和战略性活动的大扩展已经是世界上最显著、最重大、最深远的战略性事态之一，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趋势的头等表现和头

等动能之一。

然而，除非在最不平常的最紧急情况下，“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依然必须是中国的一条根本原则。不仅如此，中国未来在军事上无论可能变得多么强大，都须记住中国传统战略哲理中头等重要的一条：“兵者凶事”，“用兵不可不重也”。中国史上“战略保守主义”的一篇杰作、武帝时代初期的《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越书》援引老子“师之所处，荆棘生之”一言，强调“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不仅如此，也像刘安告诫的那样，克劳塞维茨式“战争迷雾”的最大类型之一，在于不要事先持有过分的必胜速胜信心：“《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因而，“用兵之不可不重也”。或者用《孙子兵法》的意义更宽宏、风格更凝重的第一句来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邓小平以来的当代中国基本经验总的来说简洁明了，但中国千年传统却复杂多样。现有不少学者过头地信仰和鼓吹一条，即中国根深蒂固和几乎一成不变地拥有千年儒家式的和平特性，然而纵观中国历史，却能分明辨识到历朝历代凡国富兵强，则大多大整军备，大谋武略，大图扩展。其中虽然多有势所必需之举，但内含“战略透支”可能，且亦多有并非必需而代价巨大之事。弱则委曲求全，强则耀武扬威：这权势效应不仅常见于世界古往今来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也常见于中华文明史上的皇朝时代。中国累积数千年的历史荣耀记忆，

还有植根在儒家世界观和政治/伦理哲学中的华夏文明优越理念，则进一步鼓励了传统中国史上各个强盛时期的统治者扩展国势国威，并且由此迟早大遭“战略透支”之苦，甚至其他相关祸殃。简言之，在精英腐败之外，扩展过度是中华文明史上反复出现的重大弊端，而消滅这两大祸因是所有伟大的政治领导的必要使命。

九、“中国特性”与国际共通；“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

有一项中国特性，是中国当代领导坚信中国特性本身（“中国国情”），坚信它们对从事“维护”、改革和发展的压倒重要性。可以说，这一坚定信仰就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关键的方面，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准备了它们，靠的是他坚持、倡导和教诲根据中国的特定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坚持抵制共产国际及其言听计从的中国代理人将革命“普遍主义”加诸于中国共产党。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巨大意义，而且在中国千年思想史和精神史方面有巨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依据中国国情和依靠自主实践，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成功恢复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灾难之后的自信，在当代西方早先的耀眼成功（那导致西方许多人以为“历史终结”）面前的自信。这自信的对外政策含义可以相当间接，但它的影响无论如何将是丰富的和最终强有力的。

事实开始表明，在一类大背景下，要经久地坚持毛泽东开创的上述根本的世界观和思想方式是不容易的，而这类大背景就是中国国力急速增强，中国抱负日趋远大，中国影响广泛扩展和中国对自身的儒家传统愈益自豪。若干年来，已经有那么多关于中国传统和儒家信条

的“普遍主义”、“绝对主义”和“非历史主义”谈论，导致笔者在一篇五年前发表的英语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中国人是否那么‘儒家’——在其最佳含义上，是否独特地浸透了和谐的文化/道德精神，就像那么多传统的和当代的中国作者教我们相信的那样？……不仅如此，当我们回顾千年往昔，以便最为宏观地自我探寻中国特性和比较各文明时，浮现出来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终极信念是否如此单纯、如此‘高尚’，以至在这个远不那么高尚的世界上搞糊涂了我们自己？”毛泽东在坚决抵制共产国际的革命普遍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中国传统的儒家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的礼教普遍主义。毛泽东及其主要伙伴们的根本哲理与儒家的思想方式有天壤之别：中国走自己的路，而且广而言之各国人民也要走自己的路。

然而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在坚持自身特色和自主道路的同时，必须越来越注重发现和发扬中国诉求与外部世界的广泛取向甚或普遍期望的共通性，越来越注重扩大国际共同利益和增进国际共同努力。否则，中国就是过度固守在过去相对而言力量弱、影响小、压力大的情况下完全必要的哲理侧重和战略守势，而不适应自身现在的新力量、新地位和新抱负，同时不利于建设愈益重要的中国国际“软权势”，甚至不利于促进中国的国内进步。

不仅如此，审慎，甚至上面说的“支配宇宙万物的生物式循环”理念，必须继续是决定中国对外政策方向的一大常在要素。要念念不忘最大甚或最经久的中国特性之一在于“强大的中国，羸弱的中国”。中国在拥有很可能非常辉煌的前景的同时，将面对未来重大和严峻的

挑战。最基本的挑战依然是中国的巨大的幅员和人口：这是中国的国内任务、世界地位和对外政策形势的最大常数。中国若能持久地成功应对这一挑战，世界就将因此享有巨大的裨益。不仅如此，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当代或未来中国，这巨大的幅员和人口总是中国力量的根本源泉和中国自豪的重要依据，也总是中国相对艰难的一大缘由和中国经久奋斗的常在鞭策。可以说，这就是关于中国的根本辩证原理，支配中国的根本实践。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是全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国发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为指导，以“四个全面”战略为研究框架，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特色研究领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整合中国人民大学优质智库资源而打造的、独立的非营利实体研究机构。

国发院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目标，对当前中国与世界面临的紧迫性问题进行政策与战略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三大核心研究领域，形成了十大核心研究团队和十大智库产品体系，致力于打造成为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国家高端智库。

理事会：

理事长：靳诺

副理事长：刘伟、裘国根

理事：王利明、毛振华、阎庆民、查显友、张宇、刘元春

院务会：

院长：刘伟

执行院长：刘元春

副院长：杨光斌、聂辉华、王莉丽、伍聪

电 话：010-62515049

邮 箱：nads_ruc@126.com, nads@ruc.edu.cn

网 址：<http://nads.ruc.edu.cn>



思想决定命运。

研究关乎国家方向的思想问题和话语权，

高端智库责无旁贷。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主编：杨光斌 责编：林雪霏 宋鹭